

编者按:

健康传播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传播学界的又一焦点,本期话题栏目围绕健康传播刊发四篇文章。目前,国内传播学界对健康传播的研究常常流于现象描述,缺乏传播学理创新,《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关照、模型构建与创新要素》就此话题展开论述,为国内健康传播研究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公益广告的健康传播策略评估——以香港流感广告为例》以框架理论为基础,对公益广告的内容策略进行分析。医患关系是国内近年的热门话题,《社交媒体环境下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媒介呈现研究》以近年来发生的代表性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为例,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社交媒体环境下医患暴力冲突的媒介呈现机制与困境;《当“患者”成为“行动者”:新媒体时代的医患互动研究》以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一件充满争议的“未知病毒感染”传播事件为例,讨论网络空间对医患关系、尤其是患者健康态度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关照、模型构建与创新要素

闫婧 李喜根

摘要

健康传播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因其与个人生活的紧密关联和重大社会影响力而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还停留在描述现象、个案讨论和概括此领域宏观特征的初级阶段。本文以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为主旨,探讨了如何在理论关照下开展健康传播研究,探索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健康行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考察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健康信息传播带来的人的观念、态度、行为的变化。本文详细阐述了理论模型与实测模型的构建及其对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主张健康传播研究要致力于理论指导下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探索;致力于研究课题、方法、研究结果的创新;强调这类考察与探索应该是具体的、可观察、可测量的,通过考察事物间的重要关系(变量)而实现的。本文认为健康传播研究成果需要对理解此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理解健康传播过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传播行为贡献新的知识。

关键词

健康传播、实证研究、传播学理论、理论应用、创新要素

作者简介

闫婧,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研究生, Email: j.yan@my.cityu.edu.hk。

李喜根,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 Email: lixigen@cityu.edu.hk。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YAN Jing, LI Xigen

Abstract

Health communication as a sub-area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received growing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ersonal life and its significant social impact.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scholars tend to describe phenomena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alyze individual cases, and summariz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we argue that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uld be informed by rel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plo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identify the changes in attitudes, behavior and moral values brought by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apply innovative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on percep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s relating to health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theoretical and measurement models could be used for spec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s examples of theory application to the studie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 outcome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re expected to answer key research question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and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to the field.

Key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empirical study,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ory application, innovation factors

Author

Yan Ji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j.yan@my.cityu.edu.hk.

Li Xig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lixigen@cityu.edu.hk.

近年来对人类社会有深入影响的传染性疾病屡屡发生，如2014年全世界面临埃博拉病毒的威胁；2015年世界上不少地区又笼罩在MERS的阴影之中。重大疫情的频发，使公共健康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焦点问题。同时伴随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人类健康的信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尤其是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公众的健康认知，健康信息的传播效果，以及对影响公众健康行为重要因素的考察与解析，成为摆在传播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国外健康传播研究关注健康领域的信息传播规律，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社会问题。而国内目前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多数还局限于对传播现象和趋势的简单描述。而理论指导下的，有关媒体信息及其他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公众的健康认知与行为，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与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围绕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探讨健康传播研究如何在理论指导下开展；如何通过有关健康传播实际问题的考察推进传播学理论探索；在研究过程中如何构建理论模型与实测模型，以及如何在健康传播研究中获得理论创新。

一、健康传播研究及相关理论

健康传播是人类社会围绕健康问题开展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活动。维基百科阐释了健康传播的具体内容：健康传播包括促进健康的信息发布活动，不同层面的人员之间有关健康问题的信息交流。例如公共卫生宣传活动、健康教育、医患交流等。健康传播的目的有以下主要几点：（1）增强民众有关健康问题的知识和意识；（2）影响民众对于健康问题的态度和行为；（3）展示健康的行为方式；（4）展示公共健康行为的改变带来的好处；（5）推动有关健康问题的政策；（6）增进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和支持；（7）澄清有关健康问题的误区。¹传播健康信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健康素养来影响人们在健康方面做出有利选择，通过告知民众增进健康的方式，降低并避免健康风险。有效的健康传播必须针对具体对象和情形。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认为健康传播有如下任务：分析有关健康问题的背景情况以界定有关问题；设立信息传播目的；分析不同层面和人群的信息传播对象；设计与测试有待信息传播中的概念；选择信息传播渠道；选择、制作和测试宣传信息以及相关产品；制定推广实施计划；实施信息传播战略与信息传播过程评估；以及实施信息传播结果与影响评估。²

从学术领域来看，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健康传播研究可以涉及

健康传播的不同方面,如上述健康传播的各类活动、健康信息的传播,个人与社会因素对有关健康的行为的影响等。由此可以看出,健康传播领域有无数尚待回答的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考察与探索。例如:有关健康信息的传播及其效果;人们如何应对处理有关健康的信息宣传;人们如何应对社会层面的健康危机等等。有学者对健康传播研究方向进行分类,如:张自力(2005)将健康传播研究归纳总结为9个主要方向:(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3)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7)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这些研究方向涉及健康传播的方方面面,显示健康传播研究视角的多维度、多层次,及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具体课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回答有关领域的重要问题。但是无论课题涉及哪个具体领域,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和传播学领域其它研究一样,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描述健康传播现象,而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努力揭示健康传播领域重要事物间的联系,探索事物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揭示人的观念、态度、行为的变化及其对人的健康行为、其它相关方面的社会活动的影响。

综观现阶段国内在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个人层级、人际传播层级、社会机构层级、社区传播层级和公共政策层级,其具体研究议题涉及接受者分析、青少年疾病预防、媒体报道框架、边缘群体、危机管理、传播者分析、社会支持、健康危机等(喻国明,路建楠,2011)。例如从公共政策层面以某一公共卫生危机为个案进行对策研究,提供政策建议,如:禽流感, H1N1病毒(沈国麟,韩晶晶,王凌云,2014)。或从媒体层面出发,研究与健康有关的新闻报道、专业医学期刊所刊发内容、医药广告等。描述性地呈现健康新闻报道中有关健康问题的出现频率、报道来源、以及医学研究涉及的疾病类型等(李健,宋永琴,2011;梁琪,莫扬,2007)。也有研究对健康传播领域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并对未来提出展望。这一类研究主要以健康传播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为出发点,总结其发展过程,以及在未来受到新媒体带来的“信息同质化”、“飞沫化”等现象影响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陈虹,梁俊民,2013;胡百精,2012)。蔡志玲(2012)通过分析1992年至2012年二十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健康传播”为关键词的论文发现:首先,发表于新闻传播类期刊的论文占比最高,其次分别为健康教育类期刊和医学卫生类期刊。对比1991年至2002年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医学、卫生等专业期刊上,

而传播学者普遍缺席的状况 (韩纲, 2004), 如今中国传播学者已在健康传播这个跨学科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 对健康传播论文中发表议题的分析结果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论文主要关注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 五分之一的论文以我国健康传播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 另有接近18%的论文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而在对健康传播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中, 蔡志玲发现有占比高达45.15%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 大多依靠作者本人经验得出结论并提供建议。在有明确研究方法的论文中, 文献研究法的采用率最高, 占总数的15.28%, 其次为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 分别占比11.81%及11.11%。而纵观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 传播学者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关注对健康传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 目前其绝大多数研究已转向理论关照下的、针对某一具体事件或过程传播规律的实证探索 (李小余, 2014)。由此可以看出, 国内健康传播研究虽然已开始与国际主流研究接轨, 关注健康传播媒介及效果, 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及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 现有研究仍过于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 研究成果限于现象描述、个案讨论、或对于事物宏观特征的简单总结。而在运用传播学以及其它领域的理论, 使用实证研究方法, 对健康传播现象进行系统观察, 揭示受众健康传播行为特点, 深入探索健康传播现象背后的重要事物间的联系, 有关健康传播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及健康传播规律方面则更显不足。

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观照。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同样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是精炼的关于事物间联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论述。理论是由概念和判断性语句组成的, 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明确关系, 构成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的核心认识” (李喜根, 2009)。相关理论为所研究课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课题实施的基础。理论关照不是重复测试理论所描述的定理, 而是要批判性分析现有理论以及基于理论的研究成果, 发现理论的局限、过去研究的不足。通过研究来补充理论的说明力, 或者纠正过去研究对理论证实方面的不足。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引领, 而不应是研究的羁绊。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离不开理论观照, 因为理论能更深刻地揭示事物间的联系, 并且预测人的行为。研究健康信息的传播, 人在其中的活动, 可以用不同理论进行解释。理论能帮助研究者更快进入对所研究问题过程的思考, 深入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及产生原因。例如, 关于医患交流的问题, 信息丰富性理论 (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 可以帮助分析信息交流渠道带来的不同传播效果; 创新扩散理论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可以帮助预测不同个性的患者对于有关健康信息的接纳程度。

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 因为其能够增进对人的行为规律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了解, 从长远看可以推动人类的生产与社会活动。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并不是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考察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 通常采用“知识增量”的评估准则, 即研究者对人的社会行为的重要方面, 社会活动中的重要问题, 以及社会发展重要过程的考察, 是否增加了我们对事物间关系、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了解 (刘洋, 李喜根, 2012)。如在研究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在使用网络社区获取支持的行为时, 通过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 (Uses & gratifications), 可以将不同的行为与其背后的需求动机联系起来, 揭示不同健康传播行为的动因, 从而避免健康传播研究仅停留在描述不同类型行为的层面。例如: 癌症患者主要受到人际交往需求 (Interpersonal needs) 的驱动而使用网络社区, 他们对在网上建立与其他癌症患者的个人联系有较强需要 (Wright, 2002)。只有当研究者更深入地了解行为产生的原因, 才能进一步揭示癌症患者通过信息寻求与互动交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再如, Haider (2004) 以创新扩散模型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为基础, 根据新技术采用者的分类来划分信息接收的目标人群, 使信息扩散的效率最大化。创新扩散理论在推广体育锻炼, 为低收入怀孕妇女提供诊所信息, 普及产前检查以及鼓励她们主动求医等具体的传播实践中都有应用。与空泛的政策建议相比, 这种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能更显著揭示事物间的联系, 个人与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传播行为的影响, 以及新技术对于推广健康信息和行为的可行性、有效性, 成为有关人的健康传播行为的新知识, 对政策制定和有关社会实践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除以上提及的经典传播学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外, 行为科学的理论现今也被大量运用于健康传播领域。Bandura (2004) 从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的角度, 发现对于自我效能的信念 (Belief in one's efficacy) 可以影响个人行为改变的基本过程: 包括人们是否考虑改变健康习惯、是否有能力克服旧病复发、以及如何将已改变的行为习惯保持下去。Albarracín (2001) 等人通过应用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发现, 自觉行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 可以影响使用避孕套的意愿。自觉行为控制越强, 采取此种行动的意愿也越强烈。Hazavehei (2007) 等人利用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 评估了健康教育对降低女性青少年罹患骨质疏松症风险的有效性。其中健康信念模型中用于测量评估的指标主要有: 自觉易感性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觉严重性 (Perceived severity)、自觉收益 (Perceived benefits)、自觉障碍 (Perceived barriers) 等心理因素。以上的这些研究都表明, 在理论的关照之下, 健康传播研究

不再只专注于对某种行为特点的描述，而是深刻揭示了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使研究者能够通过这些规律来预测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为社会健康部门对此类行为进行有效引导与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实测模型的构建

社会科学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与方式。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路径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产生有关研究课题的初始想法，经过文献梳理和分析找到能说明和阐释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进而逐步明确研究课题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者一般借助于模型来描述研究对象，提出具体问题和研究假设。然后通过事物的具体观察和数据采集来回答提出的具体问题或者测试假设。因此模型构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且对提出具体研究问题和假设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图1）。研究者采用的模型包括理论模型（Conceptual model）和实测模型（Measurement model）。理论模型是对事物发展过程或者相互关系的理论描述。既体现理论本身的含义，又包含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可以相对抽象，相对简练，概念不必是具体可测的。理论模型是对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在具体研究问题中的说明，是理论在具体研究课题中应用的阐释。理论模型的作用体现在可以识别论题中包含的主要概念；通过描述事物发展的过程，构建主要概念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发展假设、提出问题提供基础。理论模型的特点是简洁、严谨，并且符合逻辑，突出理论在阐释事物间重要作用，是研究课题在适用理论框架下的概要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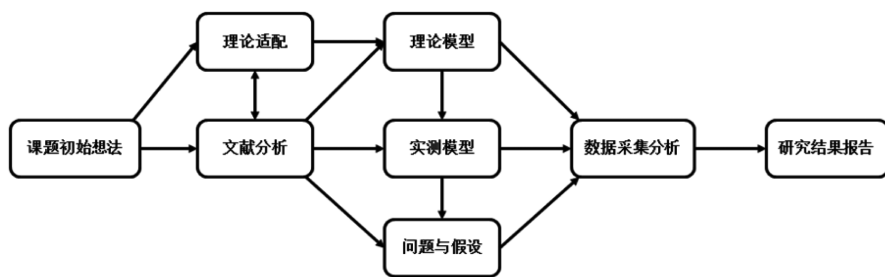


图1 模型构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与作用

实测模型是对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具体概念（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实测模型是具体的，最好能反映课题所提出的假设和问题，模型中的概念是可测的。实测模型是对研究课题中具体目标的明晰展示。实测模型的作用体现在可以识别课题中须

具体考察的主要概念；通过展示事物发展的过程，构建主要概念间的关系；是概念测量、假设测试、问题解答的基础。实测模型的特点是在理论框架下具体展示课题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及实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些概念在理论模型中可以简略呈现，但是在实测模型中需要表明其具体内涵或者维度。实测模型包含了研究课题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和即将检测的假设。通过标明实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清晰呈现研究假设或问题。

模型构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以研究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新闻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为例，通过应用第三人效果理论（Third-person effect），可以建立如下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回答有关媒介效果的研究问题。第三人效果理论提出，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介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Davison, 1983），尤其当人们接受到的媒介信息越负面、越具有冲突性时，这种倾向性则越强（Gunther & Mundy, 1993）。人们对媒介信息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认为的此信息对于他人的影响程度（Gunther & Storey, 2003; Tewksbury, Moy, & Weis, 2004）。因而个人对于他人行为的预设，可以用来有效预测个体在受到媒介影响后的行为（Salwen & Dupagne, 1999; Sun, Shen, & Pan, 2008; Xu & Gonzenbach, 2008）。在研究媒介信息的第三人效果时，对于某一特定话题的知识（Knowledge）和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是其中两个重要的调节变量（Moderator）。人们对于某个话题储备的知识越多，可感知的媒介效果则越强，媒介信息对自我及他人影响的认知差异（Self-other perceptual discrepancy）也随之扩大（Chapin, 2002; White & Dillon, 2000）。媒介接触作为调节变量时，以往研究表明，在健康传播领域，人们可利用媒介信息进行自我保护以降低健康风险，所以当人们越多接收媒介信息，则感知到的媒介对自我与他人的影响越大（Wei, Lo, & Lu, 2008）。另外，研究者们还发现人们感知到的媒介信息对自我的影响可用于预测行为结果。当从媒介报道中感知的健康风险增强时，人们更倾向于搜寻相关疾病的信息，以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并更加倾向于采取相关保护行为以控制健康威胁。Wei (2008) 等人通过研究禽流感信息的传播发现，人们感知到的媒介对自我的影响比感知到的媒介对他人的影响更能促使人们主动搜集关于禽流感的信息，并有意愿采取防治禽流感的行动。通过对第三人效果理论及相关影响变量的梳理，可以得到如下理论模型：（1）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设：人们认为媒介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2）第三人效果的调节变量：在健康传播领域，人们对某个话题具备的知识越多，或媒介接触程度越高，则感知到的媒介信息对自我及他人的影

响越大。(3) 媒介效果与行为意愿：在搜集疾病信息和防治疾病方面，人们感知到的媒介信息对自我的影响比感知到的媒介对他人的影响更能驱使人们采取行动（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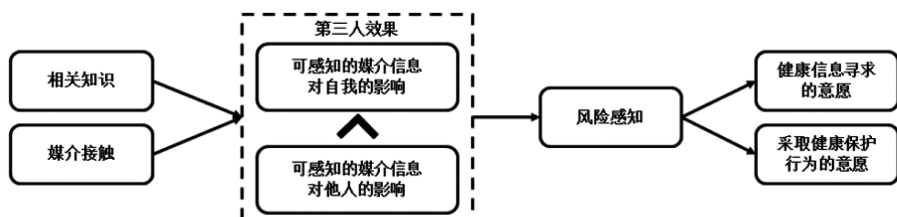


图2 第三人效果、健康信息寻求及保护行为意愿的理论模型

当理论模型建立完成后，我们要将第三人效果的理论应用于健康传播的研究，将其与实际的研究问题联系起来，构建实测模型。以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新闻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为例，首先，根据第三人效果理论，我们假设：（1）可感知的埃博拉相关报道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设）；（2）基于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知识可与感知的媒体报道对自我与他人的影响均为正相关（第三人效果的调节变量）；（3）越多接触关于埃博拉的媒介信息，则认为媒体报道对自我与他人的影响都越大（第三人效果的调节变量）；（4）可感知的埃博拉报道对自我的影响比可感知的对他人的影响，更能增强人们搜集关于埃博拉信息的意愿（媒介效果与行为意愿）；（5）可感知的埃博拉报道对自我的影响比可感知的对他人的影响，更能增强人们采取保护行为的意愿（媒介效果与行为意愿）。（图3）



图3 第三人效果、健康信息寻求及保护行为意愿的实测模型

其次，实测模型中的具体变量必须是可测量的，每个变量都需要有相对应的量化指标。其中对于第三人效果的测量会提问受访者如下问题：“媒体报道是否令你关注埃博拉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媒体报道埃博拉疫情对你产生了影响”；“在

你看来,媒体报道是否令其他人关注埃博拉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媒体报道埃博拉疫情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对媒介接触的测量则提问受访者“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上接触埃博拉疫情报道的频率”。关于埃博拉的知识则通过提问“发现埃博拉病例的国家有哪些”;“埃博拉病毒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症状有哪些”;“目前有无应对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措施”等问题来测量。搜索关于埃博拉信息的意愿在测量时可以对受访者提出如下问题:“你是否会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搜索有关埃博拉病毒爆发、传播、易感人群及防治的信息”。对埃博拉病毒的防护行为意愿的测量可以提问“你是否会特别关注预防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信息”;“是否愿意采取实际措施预防感染埃博拉病毒”;“如果预防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制成功并推广,你是否愿意接种”等。最后,完成对实测模型中变量的测量,则进一步根据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关系来验证假设、回答研究问题。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课题选择及创新要素

健康传播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无数亟待回答的问题。健康传播牵涉到社会的不同方面,是一个跨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因此健康传播研究课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健康传播研究课题可以是单纯的与健康有关的信息传播与交流问题,包括与健康有关的具体问题和实践活动,例如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影响个人健康行为的心理与社会要素;也可以是跨领域的与健康有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公共健康危机对人际互助以及社会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不论是研究单纯的健康信息传播与交流,还是研究健康传播的社会影响,健康传播研究都要避免只描述问题,然后提出有关建议的套路。课题要考虑事物间的联系,要揭示健康传播过程中的规律。例如研究医患关系,可以从不同层面去探索医患关系中重要因素之间的联系。从个人层面看,患者的哪些特征可能导致医患交流中出现什么具体问题(如:对医生的信任度、对病症的了解程度、对具体疾病治疗方案的接受程度)?医生与病人的交流方式、对健康问题的态度以及对具体病症的处理方式可能给患者对具体健康问题的了解或者对于治疗方案的接纳程度带来何种差异?从社会层面看,医生患者所处的生活环境,医生患者对与健康 and 医疗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认知对医患交流会带来何种影响?这类研究医患关系的视角,有助于揭示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深入了解医患接触互动的过程,避免对医患关系中有关问题的简单描述。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实证考察和对第一手数据的分析,揭示事物间的联系,进而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一般规律。医患关系的研究成果对人的行为和事物发展过程贡献新知识的意义远远超过为解决医患矛盾提供具体方法的意义。

在理论的关照下,有意义的课题研究还需要有创新考量,争取有创新突破。科学研究只有不断对创新思路进行考察与检测,才能对相关研究领域贡献新的知识。而检验研究课题是否具备创新特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1) 研究考察问题的角度是否不同于现有研究。例如现有的研究多探索个人因素对于健康传播行为的影响,如个人心理特征、媒介使用习惯等。也有研究探讨社会因素对于个人健康行为的影响,如个体存在的社会环境、感知的社会规范等。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交叉互动对于健康行为的影响,例如个人心理特征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人的健康传播行为有什么影响,就可能成为不同于现有研究的新角度。(2) 研究是否揭示前人未揭示的事物间的联系。例如媒体信息传播会对人的观念和行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关增进健康的信息,在一定社会心态下,通过不同媒体的传播,对持有不同健康理念的人的健康行为方面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人在面临健康威胁时会有怎样的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有关公共健康的集体行为?这类问题可能已经有一些思辨性论述,但是只有通过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实证观察,用第一手数据作为重要事物间联系的证据,才能真正揭示尚不为人所知的事物间的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3) 研究是否突破已有理论对事物现象的具体解释。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用理论的选择以及对现有理论所描述过程的质疑与挑战。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可以运用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例如人际传播理论来说明信息交流可能给人的观念和行为带来的变化,也可以借用其它领域,例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有关现象。但是无论运用何种理论来引领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本身不应该局限于对理论的简单测试。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事物本身的发展带来的变化都会要求研究者对现有理论提出质疑与挑战,现有的社会现象可能无法用现有理论来解释。例如用创新扩散理论来解释有关健康信息的传播是健康传播研究理论应用的一种选择。但是创新扩散理论产生于媒体尚不发达的年代。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和效率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信息传播过程要考虑到媒体、个人和社会因素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健康传播研究需要从其它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引入新的理论,来探测和解释新媒体条件下的信息传播现象,才可能带来理论创新。例如经济学中的有关投入产出的效益理论可以用来评估运用不同媒体寻求健康信息的效益。不同的媒介信息获取效益会对人的健康传播行为带来显著影响。(4) 研究是否有新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实验,内容分析以及其它定性研究方法。新媒体时代健康信息的传播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涉及很多不同于以往的信息传播行为。一直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依然适用,但是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新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例如对于大

数据的观察与分析、对于健康传播行为的有效跟踪调查,可能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5)研究是否对本领域权威的研究有所挑战与超越。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会有经典的,给后人研究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成果有其在本领域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事变迁,人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和研究不断深入,没有任何一项经典研究成果是不能挑战与超越的。例如,有关健康研究的经典模型“扩展平行过程模型”用于说明有关健康威胁的信息会给人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危险控制行为和恐惧控制行为。危险控制行为是基于自我效能的对于健康威胁的积极应对,而恐惧控制行为是基于恐惧的对于健康威胁的回避漠视行为(Witte, 1992)。但是该模型测试的只是事先设计的有关健康威胁的信息,并不包含人们日常广泛接触到的媒体信息。模型包含的效能只是个人自我效能,而忽略了社会成员与公共机构效能对人的健康行为的影响。模型经过修正与扩充,以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同时考察社会成员和公共机构效能对人的健康行为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说明现代社会媒体信息与相关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传播行为的影响(Li, 2015)。只有不断对传统理论和经典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和挑战,用新的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去探索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才可能不断创新。

上述有关健康传播研究创新的讨论同样符合从知识增量的角度来考察研究价值的思路,即“研究成果本身带来了多少以往研究中未发现或未揭示的、对理解有关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以及研究领域自身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知识”(刘洋,李喜根,2012)。研究的创新体现在理论的完善、方法的改进,提供对事物之间关系与规律的更深入认知。而不是简单地研究一个新的现象,或给出一个没有严格定义或缺乏可测量指标的新概念。新的事物总是层出不穷的,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这些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时,就需要对理论进行拓展与创新,并通过收集新的实证数据来检验新理论对解释现实问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样的研究就可能对所谓本领域权威的研究或者本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提出挑战,有可能发现有颠覆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

四、结语

健康传播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并获得高度关注的传播学分支,其研究在国内逐步展开。健康传播涵盖范围广泛,研究对象包括与健康有关的各类活动及信息的传播,不同人不同层面的有关健康问题的信息交流,以及应对全社会的健康危机等。与传播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研究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描述健康传播现象,空泛地提出政策建议,或只局限于对某个特殊个案的讨论,而是应该以是否对所研究领域贡献了尚不为人了解的新知识,是否产生了知识增量来衡量研究的价值。有意

义有价值的研究必然是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研究需要在理论的观照下,力求揭示健康传播领域重要事物间的联系,探索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尤其要研究健康信息传播带来的人的观念、态度、行为的变化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研究同时不能只停留于理论论述,需要通过采集第一手数据开展实证检验。参照理论所提出的每一个概念都必须是可测量的,由理论建立起的假设都必须是可证伪的。用实际数据或观察来检验、修正已经形成的理论。当原有理论无法解释面对的新问题、新现象时,就需要运用实证结果延伸已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的理论。通过理论与实测模型的构建,揭示所研究课题的理论意义以及事物发展的过程和具体研究对象间的联系。对于健康传播过程中重要事物间关系的深入理解不是针对一两个特殊案例的分析就能获得的,而是要基于大量实证数据的搜集研究,并从中总结、提炼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健康传播研究同样要有创新意识。“新”体现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揭示新的事物间的关联、产生新的知识,挑战与超越已有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因健康传播涉及个人隐私等伦理道德问题,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意细节,和对研究对象的尊重、理解与保护。在对重大疫情进行研究时,由于其爆发的不可知性,则应做好更充分的前期准备,把握研究的时效性,不错过最佳研究时机。

(责任编辑:李风萍)

注释 [Notes]

1. 健康传播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参见维基百科,检索于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alth_communication
2. 健康传播的任务参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方网站,检索于<http://www.cdc.gov/HealthCommunication/HealthBasics/WhatIsHC.html>

引用文献 [Reference]

蔡志玲(2012).中美健康传播研究评析.《东南传播》,(12),23-26.

[Cai, Zhiling (2012). Analysis of Sino-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12), 23-26.]

陈虹,梁俊民(2013).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发展机遇与挑战.《新闻记者》,(5),60-65.

[Chen, Hong & Liang, Junmin (2013).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 *Journalism Review*, (5), 60-65.]

韩纲(2004).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11(1),64-70.

[Han, Gang (2004). Absenc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 12 years studie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1), 64-70.]

胡百精(2012).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

- 案.《国际新闻界》,(6),6-10.
- [Hu, Baijing (2012). Innov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 solution to conundrum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6), 6-10.]
- 李健,宋永琴(2011).都市报的健康传播现状——以《京华时报》《新京报》为例.《新闻世界》,(6),163-164.
- [Li, Jian & Song, Yongqin (2011).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metropolis newspapers: Taking Beijing Times and The Beijing News as examples. *News World*, (6), 163-164.]
- 李喜根(2009).新闻与传播学理论以及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6(1),19-24.
- [Li, Xigen (2009).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6 (1), 19-24.]
- 李小余(2014).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传媒观察》,(8),29-30.
- [Li, Xiaoyu (2014).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Observer*, (8), 29-30.]
- 梁琪,莫扬(2007).中国报纸健康传播特点研究——对6家主流报纸健康新闻的内容监测分析.《医学信息学杂志》,(6),561-564.
- [Liang, Qi & Mo, Yang (2007).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reports in six Chinese mainstream newspapers.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6), 561-564.]
- 刘洋,李喜根(2012).新媒体传播研究及知识增量.《国际新闻界》,(8),72-78.
- [Liu, Yang & Li, Xigen (2012). New media studies and knowledge incr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8), 72-78.]
- 沈国麟,韩晶晶,王凌云(2014).禽流感考验下的中国健康传播——健康传播跨学科学术圆桌讨论.《新闻大学》,(1),100-104.
- [Shen, Guolin, Han Jingjing & Wang, Lingyun (2014). Chinese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Avian influenza: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Bimonthly*, (1), 100-104.]
- 喻国明,路建楠(2011).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当代传播》,(1),12-13.
- [Yu, Guoming & Lu, Jiannan (2011).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1), 12-13.]
-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新闻与传播研究》,12(3),42-48.
- [Zhang, Zili (2005). What's the health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Nine healthy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2 (3), 42-48.]
- Albarracin, D., Johnson, B. T., Fishbein, M., & Muellerleile, P. A. (2001). 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lanned behavior as models of condom us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 (1), 142-161.

- Bandura, A. (2004). Health promotion by social cognitive means.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31 (2), 143-164.
- Chapin, J. (2002).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chool viol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 (3), 216-225.
- 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 (1), 1-13.
- Gunther, A. C., & Mundy, P. (1993). Biased optimism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0 (1), 58-67.
- Gunther, A. C., & Storey, J. D. (2003).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2), 199-215.
- Haider, M., & Kreps, G. L. (2004). Forty year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Utility and value in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9 (S1), 3-11.
- Hazavehei, S., Taghdisi, M., & Saidi, M. (2007). Application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for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girl students, Garmsar, Iran. *Education for health*, 20 (1), 23.
- Li, X. (2015) . Media Exposur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during a Public-Health Emergenc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alwen, M. B., & Dupagne, M. (1999). The third-person effect perceptions of the media's influence and immoral conseq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5), 523-549.
- Sun, Y., Shen, L., & Pan, Z. (2008). On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2), 257-278.
- Tewksbury, D., Moy, P., & Weis, D. (2004). Preparations for Y2K: Revisiting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1), 138-155.
- Wei, R., Lo, V. H., & Lu, H. Y. (2008). Third-person effects of health new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edia exposure,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2 (2), 261-277.
- White, H., & Dillon, J. (2000). Knowledge about others' reaction to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The impact on self persuasion and third-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 (4), 788-803.
- Witte, K. (1992).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9(4), 329-349.
- Wright, K. (2002). Social support within an on-line cancer community: An assessment of emotional support, perception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motives for using the community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 (3), 195-209.
- Xu, J., & Gonzenbach, W. J. (2008). Does a perceptual discrepancy lead to act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 (3), 375-385.